

● 历史学

孝武帝诛竟陵王事与刘宋宗王镇边问题

鲁 力

(武汉大学 人文科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鲁 力(1969-),男,湖北公安人,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历史系博士生,主要从事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

[摘 要] 宋孝武帝与竟陵王诞曾先后出镇雍州,与雍州地方势力有着密切的联系。孝武帝依靠雍州势力上台后,竟陵王无疑对孝武帝的统治构成了威胁,所以孝武帝必欲诛之而后快。经历此事,孝武帝意识到由宗王镇边会造成尾大不掉之势,于是对方镇格局进行了调整。但是,这一措施却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居边异姓势力的兴起和刘宋政权的灭亡。

[关键词] 刘宋;孝武帝;竟陵王;雍州势力;镇边

[中图分类号] K 239.11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374(2000)05-0622-04

宋孝武帝刘骏为宋文帝第三子。元嘉三十年(公元 453 年),太子刘劭弑杀文帝,刘骏率众入讨,于新亭即皇帝位。攻克建康后,刘骏诛杀二兄刘劭及刘浚,随后又平定了叔父刘义宣的反叛。在两次平叛过程中,其弟竟陵王刘诞都立有大功,但后来兄弟二人矛盾激化,以至兵戎相见。《宋书》卷《孝武帝纪》载:

(大明三年)秋七月己巳,克广陵城,斩诞。悉诛城内男丁以女口为军赏。是日解严。辛未,大赦天下。尚方长徒、奚官奴婢老疾者悉原放。孝子、顺孙、义夫、节妇,赐粟帛各有差。王畿下贫之家,与近行顿所由,并蠲租一年。

在刘宋骨肉相图的事例中,至于屠城的只有这样一例。又孝武帝屠城之后,还大赦天下,普赐粟帛,以为庆事。孝武帝残酷若此,庆幸若此,原因何在呢?同书卷 7《竟陵王诞传》载:“初讨元凶,与上同举兵,有奔牛之捷,至是(讨义宣)又有殊勋,上性多猜,颇相疑惮。而诞造立第舍,穷极工巧,园池之美,冠于一时。多聚才力之士,实之第内,精甲利器,莫非上品,上意愈不平。……诞既见猜,亦潜为之备,至广陵,因索虏寇边,修治城隍,聚粮治仗。嫌隙既著,道路常云

诞反。”这些理由已经足够。但孝武帝必欲诛之而后快,似乎还有一个不得不然的背景。

刘裕在北伐过程中,曾任命诸子守卫边镇,最早的一次是义熙十三年(公元 417 年)正月留第三子刘义隆镇守彭城,当时刘裕准备西伐姚秦。刘裕攻克长安后东还,又留次子刘义真镇守长安,后义真杀死长史王修,以致“人情离骇,无相统一”^[1](卷 61,刘义真传),晋军大败而还。这种事情显然不能重演,故刘裕临终时,没有一个宗王被安置在沿边地区。刘裕的这种布置既是为了诸王的安全考虑,更是为了达到以中制外的目的。

文帝时期,则常常任命宗王坐守边镇。元嘉七年(公元 430 年),到彦之北伐,文帝命南兖州刺史刘义欣进镇彭城,以为“众军声援”^[1](卷 51,刘义欣传)。刘义欣寻迁镇寿阳,直至元嘉十六年(公元 439 年)病死方罢,历时 10 年。元嘉二十二年(公元 445 年),文帝“方事外略”^[1](卷 72,刘铄传),便以刘骏为雍州刺史,镇襄阳;罢南豫州并豫州,以刘铄为刺史,镇寿阳;以刘义季为徐州刺史,镇彭城。随后这沿边 3 镇多任命皇子守卫,襄阳继刘骏之后有刘诞;寿阳一直由刘铄镇守,至元嘉三十年(公元 453 年)方罢;彭城继刘义季之后先后由刘义宾、刘骏居之。另元嘉二十

八年(公元451年),刘义恭领南兖州刺史,镇盱眙,文帝“以兖土凋荒,罢南兖并南徐州,当别置淮南都督住盱眙,开创屯田,应接远近,欲以授铄”^[1](卷72,刘铄传),后未实行,刘铄归戍石头城。

可见,自元嘉二十二年(公元445年)以后,文帝对北伐的经营主要集中于彭城、寿阳、襄阳3个沿边重镇。镇守者并非捍边大将,而是宗室子弟,且以皇子居多。但仅仅刘义欣、刘诞稍有政绩,其余诸人则多无功勋可言。如元嘉二十三年(公元446年),魏军南下,北境扰动,时刘义季镇彭城,“愆义康祸难,不欲以功勤自业,无它经略,唯饮酒而已”^[1](卷61,刘义季传);元嘉二十七年(公元450年),刘义恭总统群帅,出镇彭城,时魏军退走,自彭城北过,义恭“震惧不敢追”^[1](卷61,刘义恭传),且欲弃城逃走。尽管如此,宗王镇边可以避免兵权旁落甚至政权易手,故文帝北伐虽屡遭失败,而宗王镇边却久久不废。这一举措固然消除了来自异姓的威胁,但为宗王的内部相争埋下了隐患。

元嘉二十二年(公元445年),刘骏徙都督雍梁南北秦4州及荆州之6郡诸军事、宁蛮校尉、雍州刺史。史言“自晋氏江左以来,襄阳未有皇子重镇,时太祖欲经略关、河,故有此授”^[1](卷6,孝武帝纪)。元嘉二十六年(公元449年),又以刘诞为都督雍梁南北秦4州及荆州之2郡诸军事、后将军、雍州刺史。时“上欲大举北讨,以襄阳外接关、河,欲广其资力,乃罢江州军府,文武悉配雍州,湘州入台税租杂物,悉给襄阳”^[1](卷79,刘诞传)。如前所述,文帝经营北伐集中在徐豫与襄阳两线。徐州的彭城与豫州的寿阳长期以来即是南北攻守的重镇,而襄阳地区的居重则是元嘉后期的事。襄阳成为此伐的重要基地,既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密不可分,又与其地方势力的发展息息相关。史言旧宛“比接二关,咫尺崤、陕,盖襄阳之北捍,且表里强蛮,盘带疆场”^[1](卷100,自序)。襄阳“疆蛮带沔,阻以重山,北接宛、洛,平途直至,跨对樊、沔,为鄢郢北门”^[2](卷15,州郡志·雍州)。江陵“去襄阳步道五百,势同唇齿,无襄阳则江陵受敌,不立故也”^[2](卷15,州郡志·荆州)。自晋末以来,“胡亡氏乱,雍、秦流民多南出樊、沔”^[1](卷37,州郡志·雍州刺史),这一带成为流民聚居地之一。东晋末年至刘宋前期,随关中地区得而复失,“三辅流民出襄阳”^[1](卷37,州郡志·冯翊太守),其地方势力得到进一步增强^[3](第36-49页)。襄阳地方势力的兴起为文帝经营北伐提供了社会基础;文帝以皇子出镇襄阳则反过来加强了襄阳地区的政治与军事地位。

至二十五年(公元448年)为萧思话取代,历时3年。刘诞于元嘉二十六年(公元449年)出镇襄阳,至元嘉二十八年(公元451年)的臧质取代,历时2年。2人在襄阳的主要活动是讨蛮与北伐,由于这些军事活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雍州地方势力,所以2人的出镇经历总是与雍州地方势力联系在一起。许多发迹于雍州的重要将领曾先后受2人指挥,有些人虽非雍州本地人,却与雍州地方势力密切相关,也曾先后隶于2人。现钩稽史料,将这些人列举如下:

(一)沈庆之。《宋书》卷7《沈庆之传》:“吴兴武康人也,……迁广陵王诞北中郎中兵参军,领南东平太守,又为世祖抚军中兵参军。世祖以本号为雍州,随府西上。……还京师,复为广陵王诞北中郎中兵参军,加建威将军、南济阴太守。雍州蛮又为寇,庆之以将军、太守复与随王诞入沔。……二十七年,迁太子步兵校尉。……(二十九年)亡命司马黑石、庐江叛吏夏侯方进在西阳五水,诳动群蛮,……十月,遣庆之督诸将讨之,诏豫、荆、雍并遣军,受庆之节度。三十年正月,世祖出次五洲,总统群帅,庆之从巴水出至五洲,谕受军略。”按刘诞于元嘉二十一年(公元444年)二月为北中郎将、南兖州刺史,镇广陵,则是月沈庆之始为刘诞中兵参军。刘骏于是年七月进号抚军将军,则是月沈庆之迁刘骏中兵参军,时刘骏为南豫州刺史,镇石头。刘骏于元嘉二十二年(公元445年)为雍州刺史,镇襄阳,则是年沈庆之随府西上。沈庆之还为刘诞中兵参军的时间不明,然沈庆之领南济阴太守,南济阴属南徐州,时刘诞为南徐州刺史,时间是元嘉二十一年(公元444年)至元嘉二十六年(公元449年)。庆之复随诞镇襄阳,时间是元嘉二十六年。元嘉二十七年(公元450年)沈庆之又还为太子步兵校尉。元嘉三十年(公元453年)正月,刘骏出次五洲,沈庆之复受刘骏统领。则自元嘉二十一年(公元444年)至三十年(公元453年)间,沈庆之两次隶属于刘诞,又两次隶属于刘骏,且先后随同2人出镇襄阳,刘骏入讨刘劭时则为刘骏司马。

(二)柳元景。《宋书》卷7《柳元景传》:“河东解人也。曾祖卓,自本郡迁于襄阳,……世祖西镇襄阳,义恭以元景为将帅,即以为广威将军、随郡太守。……随王诞镇襄阳,为后军中兵参军。……臧质为雍州,除元景为冠军司马、襄阳太守。……又使率所领进西阳,会伐五水蛮。世祖入讨元凶,以为谘议参军,领中兵,……配万人为前锋,宗慆、薛安都等十三军皆隶焉。”可知柳元景自刘骏西镇襄阳后即为其部下,刘诞代刘骏后则随刘诞讨蛮、北伐。刘骏入讨刘劭时复随刘骏。

(三)宗惠。《宋书》卷 7《宗惠传》:“南阳人也……随(江夏王义恭)镇广陵。……元嘉二十二年,伐林邑,惠自奋请行,义恭举惠有胆勇,乃除振武将军。……后为随郡太守,雍州蛮屡为寇,建威将军沈庆之率惠及柳元景等诸将,分道攻之,群蛮大溃。……三十年,孝武伐元凶,以惠为南中郎谘议参军,领中兵。”据同书卷 9《夷蛮传》,克林邑在元嘉二十三年(公元 446 年)五月,宗惠当在此后不久为随郡太守,时刘骏镇襄阳。后刘诞代刘骏,则随刘诞。刘骏入讨刘劭时复随刘骏。

(四)薛安都。《宋书》卷 8《薛安都传》:“河东汾阳人也。……(元嘉二十一年)安都与宗人薛永宗起义……归国。……世祖镇襄阳,板为扬武将军,北弘农太守。虏渐强盛,安都乃归襄阳。……二十七年,随王诞板安都为建武将军,随柳元景向关、陕,率步骑居前,所向克捷。……二十九年,除始兴王浚征北行参军,加建武将军。鲁爽向虎牢,安都复随元景北出,……仍伐西阳五水蛮。世祖伐逆,转参军事,加宁朔将军,领马军。”

(五)宗越。《宋书》卷 8《宗越传》:“南阳叶人也,……世祖镇襄阳,以为扬武将军,领台队。……(元嘉)二十七年,随柳元景北伐,领马幢,……还补后军参军督护,随王诞戏之曰:‘汝何人,遂得我府四字。’越答曰:‘佛狸未死,不忧不得谘议参军。’诞大笑。随元景伐西阳蛮,因值建义,转南中郎长兼行参军,新亭有战功。”

(六)谭金。《宋书》卷 8《谭金传》:“荒中伧人也。……及安都归国,金常随征讨。”

(七)武念。《宋书》卷 8《武念传》:“新野人也。……世祖临雍州,念领队奉迎。……擢为参军督护。”

以上所举仅为事迹显明者,事实上,曾同隶 2 人的当不止这些。据《宋书》卷 7《沈庆之传》,刘诞讨蛮时,有“中兵参军柳元景、随郡太守宗惠、振威将军刘驥、司空参军鲁尚期、安北参军顾彬、马文恭、左军中兵参军萧景嗣、前青州别驾崔目连、安蛮参军刘雍之、奋威将军王景式等”。又卷 7《柳元景传》:“二十七年八月,诞遣振威将军尹显祖出赉谷,奋武将军鲁方平、建武将军薛安都、略阳太守庞法起入卢氏,广威将军田义仁入鲁阳,加元景建威将军,总统群帅。”其中许多人可能以前就是刘骏的部下。

共同的地方势力背景为以后孝武帝诛竟陵王定下了基调,但矛盾的产生还与某些契机有关。元嘉二十八年(公元 451 年)臧质代刘诞镇襄阳,刘诞还都,寻除广州刺史,当镇始兴,未行,二十九年(公元 452 年)改授会稽太守。刘骏王二十八(公元 451 年)年迁

江州刺史,二十九年(公元 452 年)因缘江蛮为寇,文帝遣沈庆之等伐之,又诏豫、荆、雍并遣军,并受沈庆之节度,刘骏则为众军总统,于是以上所举将领几乎全部集于刘骏麾下。元嘉三十年(公元 453 年)正月,刘骏出次五洲,会刘劭弑逆,刘骏遂率众入讨,于新亭即皇帝位。刘诞则于会稽举兵,败刘劭于奔牛。事平之后,孝武帝初欲以刘诞代叔父刘义宣镇江陵,时矛盾还没有显露。后刘义宣不肯就征,于是改刘诞为扬州刺史。2 人既同居建康,矛盾的激化遂不可避免了,其导火线则是孝建元年(公元 454 年)的荆、江反叛。

据《宋书》卷 7《竟陵王诞传》,“义宣举兵反,有荆、江、兖、豫四州之力,势震天下。上即位日浅,朝野大惧,上欲奉乘舆法物,以迎义宣,诞固执不可,然后处分。帝加诞节,仗士五十人,出入六门,上流平定,诞之力也”。孝武帝得以平定荆、江反叛,所借助的仍是雍州势力,而刘诞也曾居襄阳,故“诞之力”除了在是否投降刘义宣上“固执不可”外,可能还有平叛过程中的具体指挥,这对孝武帝无疑是潜在的威胁,所谓“上性多猜,颇相疑惮”,也当包括这一层。虽然入讨刘劭时,雍州重将多集于孝武帝左右,而且孝武帝得即皇位,优势在孝武帝一边,但刘诞两次平叛都立有大功,居扬州时又“多聚才力之士,实之第内,精甲利器,莫非上品”,“上意”自然“不平”。若有意外,刘诞也不是不可以重演孝武帝借方镇之力上台的故事。故平叛不久,孝武帝即令刘诞出镇京口。又“以京口去都密迩,犹疑之”,迁之于广陵,并违背武帝遗诏,以刘延孙“据京口以防诞”^[1](卷 78,刘延孙传)。但仍觉不快,必欲除之,于是令垣闾偷袭广陵。事既不成,遂令沈庆之公开讨伐刘诞。

在讨伐过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孝武帝、刘诞、雍州将领三者之间的关系。孝武帝只能依靠雍州将领,而这些人曾为刘诞部下,孝武帝又不能完全放心,于是“每玺书催督之(沈庆之),前后相继。及晴,再怒,使太史择发日,将自济江”^[1](卷 79,竟陵王诞传),并“使御史中丞庾徽之奏免庆之官以激之,诏无所问”^[1](卷 77,沈庆之传)。刘诞对故将则犹抱希望。沈庆之方至欧阳,诞即“遣客庆之宗人沈道愍赍书说庆之,饷以玉环刀”。及沈庆之围广陵,“诞饷庆之食,提挈者百余人”^[1](卷 77,沈庆之传)。又诋其众云“宗惠助我”^[1](卷 76,宗惠传)。而雍州将领无不效忠孝武,几至刻意的地步。如沈庆之,“诞于城上授函表,倩庆之为送”^[1](卷 77,沈庆之传),为沈庆之所拒。胡三省认为“诞之为此,以帝猜忍,欲以间庆之也。庆之峻绝之,盖亦自为谋耳”^[4](卷 129 宋孝武帝大明三年四月)。可

谓得其实。又如宗恚,“恚表求赴讨,乘驿诣都,面受节度,上停舆慰勉,恚耸跃数十,左右顾,上壮之……及恚至,跃马绕城呼曰:‘我,宗恚也’”^[1](卷 76,宗恚传)。又如宗越,“及城陷,世祖使悉杀城内男丁,越受旨行诛,躬临其事,莫不先加捶撻,或有鞭其面者,欣欣然若有所得,所杀凡数千人”^[1](卷 83,宗越传)。广陵本来残破,但被围 3 个月后方陷,究其原因,除史书所云“时夏雨,不得攻城”^[1](卷 77,沈庆之传),及刘诞“在一定程度上得人心支持”外^[5](第 201 页),恐怕与沈庆之的犹豫顾望也有很大关系。

正因为竟陵王与孝武帝有着共同的雍州地方势力背景,对孝武帝的皇权构成了潜在的威胁,所以,孝武帝必欲诛之而后快。这里自然有不乏巧合的因素,但究其根源,却正体现了宗王镇边的后果。此前刘铄被杀,固然是因为他“素不推事世祖,又为元凶所任”^[1](卷 72,刘铄传),但更重要的,恐怕在于他也是长期镇边的宗王之一,有比较强大的势力。而刘宏“徘徊天人,优游经艺”^[6](卷 48,故侍中司徒建平王宏墓志),则备受孝武帝喜爱。陷广陵后,孝武帝显然汲取了教训,大明五年(公元 461 年)刘义恭上表陈限制宗王之法,第一条就是“诸王贵重,不应居边,至于华州优地,时可暂出”^[1](卷 61,刘义恭传)。刘宋后期,宗王镇边的事例已经很少,即或有之,任期也极为短

暂^[7]。如刘昶镇彭城才 1 年零 3 个月即被逐奔魏,刘休若镇襄阳不到 2 年即迁至湘州。但孝武帝的诛杀和对方镇格局的调整虽可减少来自宗室内部的威胁,却导致了居边异姓势力的兴起,后萧道成能起于淮阴并取代刘宋,就是孝武帝以来限制宗王镇边的直接后果。所以王夫之认为刘宋灭亡,“不可谓非孝武之师先也”^[8](卷 15,第 1161 页)。

参 考 文 献

[1] 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 萧子显.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
[3] 张琳.东晋南朝时期襄阳地方社会的变迁与雍州侨置始末[A].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 15 辑[C].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
[4] 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5] 周一良.刘宋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之变化[A].魏晋南北朝史札记[C].北京:中华书局,1985.
[6] 欧阳询.艺文类聚[M].北京:中华书局,1965.
[7] 万斯同.宋方镇年表[Z].二十五史补编[C].上海:开明书店,1935.
[8] 王夫之.读通鉴论[M].北京:中华书局,1975.

(责任编辑 张 琳)

Emperor Xiaowu’s Killing King Jingling & Changing Policy of Frontier Defence in Liusong Dynasty

LU Li

(School of Humanities,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y LU Li (1969-), male, Doctoral candidate, School of Humanities,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history of Wei, Jing, Southern, Northern, Sui and Tang dynasties.

Abstract Emperor Xiaowu and his brother, King Jingling, had held the Xiangyang garrison successively. Both of them had been in close contact with the Yongzhou group. After ascending the throne with the help of Yongzhou group, Xiaowu awoke to the menace of Jingling and killed him. Later, Xiaowu realized the serious consequences of ordering royal clansmen to hold the frontier garrisons, then he changed the policy of frontier defence. But this eventually led to the rise of different families and the fall of the Liusong Empire.

Key words Liusong; Emperor Xiaowu; King Jingling; Yongzhou group; garrison